

余姚乡贤编

余姚市乡贤研究会论文选编

第一辑



余姚市乡贤研究会



余姚乡贤论

余姚市乡贤研究会论文选编

(第一辑)

黄子

一九八八年三月

转赠余福海主编

余姚市乡贤研究会编

一九八八·十二·

前 言

余姚古邑历来为灵秀之所钟，姚江两岸孕育了众多的名人学士。尤以明清之际，人才荟萃，“姚江学派”树天下万国士林之烟标；“浙东史学”开近三百年史界之先河。学者梁启超曾说：“余姚区区一邑，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及海东。”因此，余姚有“文献名邦”之称。

为研究乡贤，认识乡贤，集本市同好者于1984年成立了“余姚市乡贤研究会”。“乡贤研究会”以客观的历史价值观念、科学化的认识模式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虚美，不隐恶，探究乡贤遗迹，整理乡贤文献，研讨乡贤著作，评说乡贤学术思想。旨在继承姚江精神，发扬浙东学风，为推动和促进国内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开展尽绵薄之力。

“乡贤研究会”每年开一次年会，以论文形式研讨乡贤思想、著作、事功为主，辅以参观考察活动，佐证和充实论文内容。近年来取得了初步成果，积累了以写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梨洲四先贤为主的论文若干篇。这些论文，部分已得到有关报刊的选用，并且引起了东瀛学界的重视，多次派遣访华代表团来姚，与“乡贤研究会”进行学术交流。今年，日本藤树学会在“日本的王阳明”——中江藤树纪念馆开馆时，特邀我市“乡贤研究会”名誉主席章亦平赴日参加开馆典礼，亦是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种活动。现将部分论文汇集成册——

《余姚乡贤论》，供史哲及乡邦文献爱好者和专业者参考，意在抛砖引玉。

乡贤论文，人物不拘，凡历史上有建树者，均可作为乡贤，并可以评说。本会欢迎有更多的新作者继续赐稿，以求再出续集。

本书集撰稿者均为业余史哲爱好者，陋拙疏，学识、资料等局限，难免偶荒和肤浅。冀有这些，余姚学林有识之士不吝赐教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在日本中江藤树纪念馆

- 开馆仪式上的演讲.....章亦平 (1)
- “文献名邦”略考.....姜桂先 许扬武 (8)
- “客星犯御座”与严光之隐.....诸焕灿 (13)
- 王阳明心学的思想解放作用.....诸焕灿 (24)
- 王阳明军事生涯刍议.....徐仲力 (45)
- 王阳明的人本思想.....邵九华 (58)
- 论王阳明的工商思想.....诸焕灿 (62)
- 王阳明余姚史迹考述.....邵九华 叶树望 (72)
- 王阳明历年行程.....诸焕灿 (85)
- 《余姚朱氏宗谱》与朱舜水家世.....叶树望 (90)
- 有关朱舜水两点史实略说.....诸焕灿 (107)
- 朱舜水流亡日本探析.....邵九华 (111)
- 黄宗羲“梨洲”“南雷”
- 两号探微.....徐仲力 诸焕灿 (117)
- 黄宗羲经济思想简论.....叶树望 (128)
- 黄宗羲的教育思想.....黄绍云 (143)
-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 的民主启蒙思想.....邵九华 (154)
- 梨洲先生故居考.....徐仲力 诸焕灿 (164)

黄宗羲“续钞堂”考辨·····	诸煥灿	(171)
“续钞堂”始末·····	邵九华	(181)
竹桥黄氏述略·····	叶树望	(187)
《宋史·赵善誉传》补正·····	叶树望	(198)
舜生于余姚浅议·····	诸煥灿	(202)
黄宗羲故居考·····	邵九华	(208)

在日本中江藤村纪念馆 开馆仪式上的演讲

(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下午)

章亦平

尊敬的诸位先生：

今天，能够参加这个演讲会，感到荣幸。中江藤树先生是日本最早研究、传播王阳明学说的一位学者，作为王阳明家乡的乡贤研究会的代表，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些王阳明和阳明学说的情况。

三国时的《易》学家，余姚人虞翻曾说过：浙东余姚是一个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的地方。她不仅以物产之丰沛称美于国内，而且，更以历代名人辈出知名于海内外。一九二五年，学者梁启超给《余姚评论》的信中说：“余姚区区一邑，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及海东。”由于余姚历代多硕儒名人，因而，素有“文献名邦”之称。在众多的历代名人之中，“阳明夫子”更是名震宇内，传扬海外的千古大师。

阳明夫子名守仁，字伯安，明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公元一四七二年）出生于余姚镇龙山后瑞云楼，明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病死在南安途中，安葬在绍兴花街洪溪。他是东

晋时“书圣”王羲之的三十四世孙，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和书法家，为清代学者公认“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的伟人。

对于王阳明一生的业绩，已为众人所知悉。他才高学邃，身为文臣，资兼文武。文创“阳明学派”，武建“直节丰功”。但却是一个很不幸的人，一生劳苦，结果“功高遭忌”，多次遭受到迫害和打击，可以说是生不得志，死犹遭忌。对于他的学术思想，很长时期毁誉交至，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在目前，西方世界正在掀起一股研究东方文化的热潮，我们有必要对王阳明的心学以及这一学说对明清以来直至当前社会思想的影响，展开新的研究和反思，把王阳明学说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为中国、为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自孔孟创立儒家学说，经汉代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到了宋代，经二程对儒家的解释之后，儒学发展为理学，尤其到了朱熹，完整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成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毒害最深远的哲学思想。朱熹认为，人心符合天理，称作道心，是至善的；人心违背天理，就是人欲，是至恶的。“不是天理，即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要求人们“视听言动，非理不为，”人人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封建伦理道德，排斥人们独立思考和主动精神。程朱提出的以封建依附关系为内容的“天理”，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极大欣赏，自南宋至明代，自朱熹至王阳明的三百年多时间中，唯知程朱理学为真理，经朱熹注释的《四书》、《五

经》成为全国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程朱理学成了统治阶级控制人们思想的重要工具，以致“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对于这一权威理学，在王阳明之前，几乎很少有谁能够给予公开批判和否定。

明中叶以后，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已经萌芽。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正统儒学，思想僵化，学术空疏，道德虚伪，已经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历史发展要求产生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替代陈腐的思想体系。王阳明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王阳明的心学正是适应了这种历史发展的要求应运而產生的新的思想体系。

王阳明一生潜心学问。幼年在家乡启蒙，少年跟随父亲身边读书，十八岁时，到江西拜著名理学家娄谅为师，开始研讨朱熹理学。他承袭了孟轲“人性本善”的观念，并且受唐代佛教禅宗关于“善端”、“佛性”等的影响，通过对程朱与陆九渊哲学的比较，形成并提出了自己的“心学”观点，对程朱理学展开了攻势。王阳明首先否定了程朱理学“理”的外在性，主张把“理”置于每个人的心中，认为“吾心良知”。朱熹主张客观的“天理”主宰世界，王阳明则主张主观的“吾心”主宰世界，创立了“致良知”的命题。他曾说：“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他提出，为人要达到“完善完美”的“致良知”，就必须“格物”，所谓“格”，就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良知人人皆有”，每个人只须“为善去恶”，“格物致知”，彻底清除掉内心潜伏的恶念，就可以达到个人的自我修养。他提倡不要随便指责人，不要埋怨别人，万事要互相忍

让，强调通过端正自己的行为来达到个人修养功夫，“修身在正其心”，来达到“良知”。王阳明有四句话概括了他的“致良知”的观点：“无善无恶是心之本，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在他三十八岁主持贵阳书院时，又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以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他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两者密切联系，不能脱节，这就使王阳明的心学体系趋向完善。王阳明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知行如何分得开”，批评了当时知行脱离，言行相背的衰败学风。

王阳明还提出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同思想，设想有一个君主贤明、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王国。这在封建专制主义越来越强化的时代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虽然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在程朱理学盛极一时，并得到朝廷重视和提倡，理学牢固地控制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对事物进行思考，一切以程朱理学是非为是非的当时，有它积极的进步意义。

王阳明把“吾心”作为万事万物的主宰，“心即理”，这样，就把人的主体地位从“天理”的顺能者变为拥有者，从被主宰的地位变为主宰的地位。既然“吾心”处于主宰的地位，主体的良知自然能成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王阳明说：“夫学贵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之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

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否定了以孔子、朱子的是非为是非，主张把真理交给大家。他还公然宣称：“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万物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认为人人心中有一个“圣人”，只要努力争取，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他从根本上来反对僵死的程朱学说，启发人们破除迷信，大胆地进行思考。王阳明的这些观点，给当时独尊理学、因循守旧、奴颜卑膝、空气沉闷的思想界，犹如一颗炸弹，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大大地鼓舞并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人们积极思考的主动精神。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余姚人黄宗羲曾说，“自宋元明以来，经生学人只知习熟先儒之成见陋说，使天下汨没于支离章句之中。及王阳明出，以心学教天下，学风才得大震”。王阳明的学说对统治阶级来说，自然是一种异端。所以，在王阳明刚死不久，嘉靖皇帝就采纳御史游居敬的意见，禁毁王阳明的书籍，捣毁王氏学生继办的书院，禁止王氏学生外出讲学。然而，禁是禁不住的。以后，尤其是王学的继承者王艮、李贽、唐甄、汤显祖等更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礼教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李贽创立了反对封建道德虚伪性的“童心说”。到了明末，绍兴人刘宗周，又沿着王学的“慎独”、“事上磨炼”一端发展，刘宗周的学生余姚人黄宗羲在编纂《明儒学案》时，就以王阳明为王学的宗师。他本人也沿着刘宗周所开拓的王学方向，把王阳明反对程朱理学传统束缚的思想，发展为对整个封建制度的否定。他的《明夷待访录》，就是全面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名著。

王阳明的学说，在日本受到极高的评价，给日本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仍在受到重视，有许多学者在研究它。近江圣人藤树先生在开始时是研究朱熹理学的，在他三十七岁学了《阳明全书》之后，认为只有阳明学说才能解决日本的社会问题，因此，全力研究阳明心学，终于成了日本最早的阳明学者，使阳明学说在日本得以传播。

王阳明不仅创立了“心学”体系，在教育思想上，他通过自身讲学二十三年的教育实践，总结出了一套符合学生心理的教育学说，在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方面，提出了不少进步的主张。他认为人的道德观念不是天赋的，是在社会道德舆论的熏陶下和家庭学校教育的影响下形成的，主张人应该受教育，通过潜移默化的功夫来达到为善去恶。他提出“无懈怠，无亏缺，无放荡，无欺妄非僻”的要求来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他明确要求“授书不在徒多，但贵在精熟”，“学问要点化”。他特别强调“立志”。曾对学生说“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能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无所底乎！”王阳明还致力倡导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公开辩论的学风，还强调“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原则。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很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发扬。

作为王阳明的故乡——余姚，为了适应当前国内外研究东方文化的需要，也为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我们成立了“余姚市乡贤研究会”，与国内外有关学者共同研究、交流包括王阳明在内的余姚乡贤的学术思想。同时还在积极征集有关王阳明的文献资料，包括各类有关笔记及王阳明的手迹和匾额。余姚市人民政府计划逐步修复与王阳明有关的遗迹，俾

瑞云楼、姚江书院、理学旧居、讲学处等等；绍兴也在修复王阳明的墓地。浙江省社科院亦在标点新版《王文成公全书》。目前，在中国国内社科方面的刊物上，有关王阳明及“阳明心学”的研究文章正在逐渐增多。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在贵州首先举行了“王阳明学术讨论会”；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浙江省社科院与余姚市人民政府将在余姚召开“王阳明学术讨论会”，届时，将邀请国内外学者进行学术讨论。

王阳明的精神是伟大的，他的学说是光照千古的。王阳明是“姚江学派”的创始人，是浙东余姚的先哲。我们希望阳明精神永存。



“文献名邦”略考

姜桂先 许扬武

余姚“文献名邦”之称，由来已久。但该称出于何因？又始称何时？知详者甚寡。笔者查阅史料，草此略考，求教长者。

“文献”者，即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文物图书资料也；“名邦”者，即文才超众，名人学士辈出之意也。故“文献名邦”应谓有渊博知识，有文才贡献，有众多学士之地。据前辈蔡凤仪等说，历史上称“文献名邦”者有二，即孔子、孟子诞生地的曲阜和邹县。余姚竟然有此美称，邑人无尚光荣。

六十多年前——一九二五年，学者梁启超给《余姚评论》信中说：“余姚区区一邑，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及海东。阳明千古大师无论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黄氏自忠端以风节历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为明清学术之重心；邵氏自鲁公、念鲁以迄二云，问世崛起，绵传不绝。《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体，则足以卓然自树立。”（《饮冰室文集》）这段话道出了余姚堪称“文献名邦”的原由和意义。

余姚自秦汉间建县以降，旧多英俊之士。据史载查考，名

耀遐迩的即有：东汉严子陵（公元前37年——公元43年）以“高风亮节”名世；三国时的虞翻（162——233年）是当时南方著名《易》学权威；东晋有虞喜（约271——346年），天文历数学家，著有《安天论》，首次发现“岁差”；唐初有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558——639年）；宋有著作家、方志学家高似孙；元末明初有史学家、散文家宋濂及医学家滑寿，滑寿（1304——1386年）著有《十四经发挥》等，查证了六百四十七个医治穴位，对早期麻疹患儿提出有“口腔粘膜斑”，医学上称之为“滑寿氏斑”。

在明代，姚城学士更是风靡天下，为海内所注目。尤其是“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池北偶谈》）的第一流人物王阳明（1472——1529年）更为世界所瞩目。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梁启超先生也曾说：“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阳明不仅在事业上建立“直节丰功”，更在学术上开创“阳明心学”，又称“姚江学派”，对宋代理学给予反击，解放了当时的思想界，实为近五百年来思想解放的先驱。朱舜水（1600——1682年），是明清之际讲究实学的学者。他曾多次拒绝朝廷的征聘，明亡后，为抗清反清，往返海隅，辛劳奔走国事。最后因抗清无望，寓居日本，受宾师之礼，讲学以终。他的学术活动对日本的史学、艺术、建筑等有较大影响。黄梨洲（1610——1695年）是清初著名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是浙东史学的鼻祖。其父为东林党名士，被宦官陷害。黄梨洲曾入京为父讼冤，以铁锤伤鞫鞫同党，后为东林承袭推崇，领导“复社”，坚持反宦官权贵斗争，险遭残杀。

清兵南下，在家乡招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武装抗清。后入四明山结寨，被驻守舟山的监国鲁王封为左副都御史。明亡后，隐居故里，悉心讲学著述。清廷召他主修《明史》，固辞不就。他学问渊博。史哲、文学、天文、历算无不精通，著述甚多。所著《明夷待访录》实为辛亥革命之先声。对王、朱、黄，世称“三先哲”，加上严子陵，历称“余姚四大历史名人。”

继而又有邵二云（1742—1796年），是清乾隆三十六年的会元，是继梨洲之后的杰出史学家。他曾入“四库馆”，负责《四库全书》“史部”纂修。后又编修《续三通》《八旗志》，补辑《旧五代史》。诸如此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者，历代不乏其人。

据查，录入《中国人名大辞典》的余姚名人，余姚籍的一百八十人，隐居余姚并落户的三十五人，合计达二百一十五人。余姚人考中进士的仅以北宋中期皇祐元年（1049年）算起，宋代一百二十五人，元代五人，明代三百八十七人，清代九十五人。另有武进士（明清）六十二人。

余姚又有“十八学士三状元”（实为十七学士五状元）之说。“十八学士”在历史上有此称说，唐太宗造文学馆，有十八学士，虞世南即其中之一；又开元年间，有张说等十八人为学士。因余姚出学士甚多，泛称而来，此一说。又谢丕少宰在大湖门西截湖为堤，以通驿道，建彩桥其上，与进士十八人高宴以落成之，此又一说。再一说，即嘉靖十四年（1535年），全国考取进士三百二十人，余姚人考中此科的有韩应龙等十七人，占百分之五·五三，堪称一魁。此科又以韩应龙为状元榜首，孙璘为榜眼，由此遂称“十八学士”。余姚共有状元五人，宋代

两人，即庆元二年莫子纯，景定三年方山京。其中莫子纯因赴试前已有官职，试后退作第二名。明代三人，即成化十一年谢迁，后官至东阁大学士，为明代名相；成化十七年王华，即王阳明之父；嘉靖十四年韩应龙。查明代二百七十七年中，共出状元八十九人，余姚占了三人。而谢迁与王华之间又相隔仅仅六年，余姚真不愧为学士、状元屡出之地。上述乃“文献名邦”由来之渊源。正如《嘉靖余姚县志》所言：“余姚代称多才，邇际选举者多矣。”

“文献名邦”之称，究竟始于何时，迄今难有正确史料考证。但有两点可据。一为《余姚县志》对“文献名邦”虽无详细记载，但在《乾隆志·序》中曾提到“况余姚为文献名邦”数字。写序时间是乾隆四十三年三月，由此可知在乾隆以前已有“文献名邦”之称。二为黄梨洲石碑亭额书有“名邦遗献”四字，这说明黄梨洲是“名邦”后献，在黄梨洲（1610—1695）在世或生前已有“文献名邦”之称。以此推论，始称“文献名邦”迄今已有三百年或更长的时间了。

关于“文献名邦”称谓之来历，从现有资料断定，决非御赐，因有关史料中无此片纸只字记载。而认为民间外地名流赠予者较为可靠，而且亦有此传说。再则，该称谓应是先有口传，然后才有笔录。现查首书成匾者，应为史鸿（1573—1652年）号冲寰。清初（1649年）余姚知县胥庭清到任，他对前朝遗献欲置“文献名邦”匾额，曾示告四方，以重偿征善书者。后投寄者甚多，但无一中选。一日，有一书生潜入县署后厅，挥毫书成“文献名邦”四个大字，然后悄然离去。胥知县见书大悦，召之不应，亲自走访，也避而不见，遂留“学古”两字旌其庐（在现管家弄）。这位书生便是史鸿。（《余姚史